

· 追寻安徽文明之光 ·

从凌家滩到禹会村 实证中华文明起源“高光时刻”

分居长江、淮河两条水系的凌家滩和禹会村，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安徽首推的重点遗址。5300年前的凌家滩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代表性遗存，也是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在一片稻香中制玉纳礼，用组织化劳动的烟火升腾璀璨文明之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考古工作者确认古史传说时代“涂山之会”，实证这一揭开华夏王朝文明大幕的动人历史场景，还原中华文明起源“高光时刻”。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孙言梅

凌家滩人：住在长江边，制玉稻花间

——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人，开荒种地、建设家园、享受生活、思考审美，是走上文明化道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的超大型聚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标志性遗存

秋风微凉，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稻基地的“稻田画”迎来观赏期，巨大的玉龙图案跃然摇曳在生机勃勃的稻田里。

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人对水稻丝毫不陌生，这是他们的食粮。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村，裕溪河中段北岸，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一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时间回溯至1985年，这座埋藏在地下5300年之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很多考古遗址一样，因为一次偶然机缘，抖落时间的尘埃，展现历史的精彩。

考古人员将这里发掘出土的土壤进行过水、补选，发现了碳化的种子，鉴定为水稻；对出土残碎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发现有家猪。浩荡长江流过身边，丰盈的河水将这片广阔土地滋养得生机盎然。凌家滩先民已经掌握了水稻栽种技术，发现粳稻和籼稻，饲养和捕食猪、鹿等，凭一身颇为先进的农耕技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的烟火升腾成璀璨文明之光。

自1987年以来，凌家滩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这是长江中下游巢湖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大量玉器陆续发掘出土，一件件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玉人、玉龙、玉鹰、玉璜、玉龟和玉版……惊艳了世人，刷新后代的历史认知。这些多彩、温润、有特殊肌理图案的美石，成为可以容纳权力、财富、审美、品格，甚至代表天地鬼神的灵物。凌家滩的玉器已经发现1000多件，制玉工艺上已形成切割、琢磨、管钻、掏膛、减地、浅浮雕等技术。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被誉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三大玉文化带。

今天的人们惊叹于凌家滩精美的玉器、高度发达的制玉技术，更应看到隐藏在其后的大量远古社会生活信息：6件玉人雕刻

出冠帽、装饰，表明这里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数量丰富的出土玉器，彰显着凌家滩人的神巫、图腾等远古崇拜的观念氛围，玉器被赋予某种神圣性；随葬玉器成为一种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高等级制礼性器物，反映了当时凌家滩的社会体系、器物初纳礼制，辅助规范等级秩序。

2008年以后，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重心从墓葬转向聚落方面。没有辜负一番辛苦探查，这座“城”为我们带来诸多惊喜：这是一个有着内外两条环壕的超大型聚落。从壕沟、祭坛等大型建筑看来，先民们已经掌握了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能力，反映出有组织性的社会调度能力。

凌家滩先民生活图景渐渐清晰：居住区有逾200平方米的建筑物，内外两条环壕堪称大型水利工程，原始宗教活动在大型祭坛举办，公共活动在红陶块广场进行。人们从事稻作农业，兼及养殖、渔猎和采集，同时从事玉石器与陶器制作、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开荒种地”、饲养牲畜，建设“城市”、保卫家园、享受生活、思考审美……凌家滩玉器，体现远古制造之美；拥有丰富“精神食粮”的凌家滩人，成为中华先民文明化道路上筚路蓝缕的“先行者”。

凌家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最终汇聚于长风浩荡的中华文明长河。“凌家滩作为区域核心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中。它的年代比较早，内涵非常丰富，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目前，负责凌家滩考古发掘工作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副主任张小雷说，考古团队仍然在为更全面清晰地揭示遗址聚落真实形态而执着努力。

禹会诸侯：淮畔传古史，考古得实证

——距今4300年至4100年间，当长江中下游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之际，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中原地区吸收汇聚了周围各地先进文化，从而进入王朝文明。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佐证了史书记载的那场“万国大会”。此后，华夏王朝时代逐渐拉开大幕

在安徽境内，与“王朝文明”紧密关联的大遗址，是位于蚌埠的禹会村遗址。

《左传》中提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会诸侯不是传说，蚌埠就是“禹会诸侯”之地，禹会村遗址的发现，让



文物修复专家正在对禹墟出土陶片进行修复。(资料照片)

《左传》里的这段话有了考古支撑。

蚌埠市博物馆一方展厅内，重现了当时的场景：涂山之麓，会盟场上，用天子之礼祭祭苍天，旗帜招展。众多诸侯手持玉帛等礼器礼品朝拜大禹，在禹的号召下誓言结盟，将带来的祭品焚烧共祭，从而在各灰坑留下不同文化的陶器。

场景复原的依据来自考古发掘对那一块“万国大会”的确认：涂山发现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坛，用灰土堆筑，铺垫黄土，上覆白土。其上有1米见方的方土台；长达50米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呈中轴线南北走向，正指向涂山山脚。中轴线上，还有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作为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众多的灰坑呈现来自周边不同地区文化的器物，说明35个柱坑应是当时来会诸侯插旗的遗存。

禹会村遗址，从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聚落而来，又与龙山文化城址交相辉映，串起了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而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可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的标尺之一。

考古专家介绍，禹会村遗址2007年发现“祭祀台”，2017年发现两段台基和若干解剖点构成了闭合的城垣，推测城址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内包含丰富的人类生活遗存，城址外围200万平方米范围内龙山文化遗迹散布，反映龙山时代淮河流域中游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也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记录。

禹会村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历

史学研究提供新资料和新视角。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淮中下游一带。治水成功后，禹又征伐三苗。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彼时的三苗分布在江淮、荆州一带。当时禹墟一带所在的淮河流域以其四通八达的水系，便于交通四方；又是淮夷分布区，淮夷是分布于东南地区的东夷的一支。禹挟治服洪水和战胜三苗之威，就近北上，在此娶涂山氏女，以婚姻为纽带与东南地区广大夷人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会盟四周围方首领，从而树威立信。省政协副主席、历史学家李修松认为，禹死后，诸侯们不去拥戴禹选定的接班人伯益，而拥戴禹子启，以至能推翻传统的禅让制，而代之以王位世袭制，建立夏王朝。可以说，涂山之会催生了夏王朝，开启了华夏王朝时代的文明序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将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列入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支点。他希望以禹会村遗址这个淮河流域唯一的夏文化研究基地为依托，全面展开夏代早期文明研究的新篇章。

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从多边崛起，此起彼伏、交相辉映、蔚为大观的古国文明，走向夏商周的王朝文明，用了千余年时间。江淮大地又给后世呈现了哪些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继续关注。



更多内容
扫码阅读

· 提升安徽文化影响力大家谈 ·

扮靓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要重视“桐城派”遗产

■ 江小角 卢坡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上海、江苏、安徽等13个省区市。发挥桐城派文化遗产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作用，彰显安徽地域文化特色，意义重大。

桐城派文化影响力大、辐射力强。桐城派以地域命名，主要因为早期重要作家如方以智、钱澄之、潘江、张英、方苞、张廷玉、刘大魁、姚鼐等皆为桐城人。桐城派在清代乃至近代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一是因为理论体系完善，桐城派作家以唐宋八大家为师法对象，善于总结为文之道。二是创作特色鲜明，大多数作品“言有物，言有序”。三是桐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师事、私淑或膺服桐城派的作家，计1300多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四是桐城派不仅在国内外影响深远，还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产生一定的影响。

桐城派文化具有时代价值。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说出：“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这其中就包含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姚莹继承姚鼐“因时而变”的思想，在国家多难之际，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补充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说，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多闻”。此外，历史上的桐城人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绘画、戏曲、翻译等领域，都作出较大贡献。如今，总人口不到75万的桐城，先后走出3000多名博士、近20位院士。由清代的“中国文都”到今天的“院士之乡”，桐城文脉如长江之水，延绵不断。

桐城派文化遗产旅游价值高。桐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城轮廓清晰，格局肌理未变；历史街区体量宏大，名镇老街古村落星罗棋布，名人故居、文物胜迹异彩纷呈。目前，桐城市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其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已发现的地面文物500余处，其中方以智故居、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府遗址（五亩园）、惜抱轩银杏树（姚鼐故居）、姚元之旧馆、光昭诸家族老屋、姚莹故居、勺园（方宗诚、方守敦故居）、马其昶家族老屋、桐城中学藏书楼半山阁等一批桐城派文化遗产，极具文化遗址旅游利用价值。博物馆收藏的桐城派名家文物在全国独树一帜。桐城文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江淮之间保存最完好、最具特色的祭祀建筑。“让他三尺又何妨”，六尺巷克己谦让、平等待人的精神内核教化人心、流泽当代。这样的文化遗产，不仅有“讲头”，而且有“看头”，游客在游览之余，还能感受学习古人“崇文重教”“礼让廉洁”等优秀美德。

桐城派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长江文化带独特的亮丽风景线。如何加强桐城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彰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安徽影响力呢？

对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做好桐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突出文化遗产魅力。2021年，桐城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桐城派文化即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桐城派作家生活的四条老街（南大街、东大街、北大街、孔城老街）保存完好，城区保留下来的名人故居、遗存成片分布。要将桐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规划上体现国家精神和要求，发挥其新时代的新价值。

重视桐城派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保护，发挥文化赋能发展的内生动力。龙眠河、挂车河、孔城河、嬉子湖、菜子湖等，这些长江水系与桐城派文化孕育形成的风景区，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而且存有众多底蕴深厚的文化遗存。对于这些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结合的文化景观进行统一规划、科学保护，保持其完整性和延续性，带动旅游观光等相关产业提质增效，这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规划理念协调一致；应使桐城在文化遗产传承、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实现有机结合，在全省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重视桐城派名人遗存和纪念性建筑的合理利用，提升安徽文化的影响力。八百里皖江滋养着安徽长江两岸的人们，养成了皖江人特有的秉性，留下了值得书写的历史。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建设，要给游客带来“安徽体验”。重视桐城派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使之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大亮点，彰显安徽特色，突出安徽气派，能为安徽文化品牌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长江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经巴蜀，过荆楚，穿吴越，最终汇入大海。由长江孕育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各具精彩，作为楚尾吴头的安徽，长江在此做归海前的盘桓蓄势，又以其博大与包容孕育出上接湖湘、下承江南的桐城派文化。长江流域独具文化特色的桐城派及其文化遗存，理应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增添光彩、彰显魅力。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本报记者 徐曼昊 摄